

王安石诗文五首系年考

刘成国

对于王安石的诗文,自南宋李壁开始,一直到清人顾栋高、沈钦韩、蔡上翔等人,均曾爬罗剔抉、断断续续地做过许多考证^①。今人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更是在比较全面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现存大约三分之二的王安石诗文做了编年,创获良多;高克勤《王安石散文精选》、《王安石诗文选评》,刘乃昌《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等选注本也对王安石的一些作品做了编年考证^②。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体现王安石学术思想、文学成就的重要诗文仍未得到确切系年。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其中五首略作考证。

1. 《临川先生文集》卷四《桃源行》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此篇是宋诗史上的名作,历来评论家们均赞不绝口。或谓其“词意清拔,高出古人”^③,或分析其表现手法“纯以议论驾空而行”,“必有名论杰名,以见寄托”^④。程千帆先生曾将此诗专门拈出,论述它与王维、韩愈等问题之作的特色所在:“王安石这篇单刀直入,几乎全无景物铺陈,但以议论见长的宋诗,不正

①詹大和、蔡上翔等:《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沈钦韩:《王荆公诗文沈氏注》,中华书局,1959年。

②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高克勤:《王安石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王安石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刘乃昌:《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此外,近些年汤江浩、寿涌、杨天保等学者也对王安石的部分诗文系年有所考证。

③王得臣:《麈史》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88页。

是以此‘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经几秦’这样一些名论杰句，反映了自己先进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思想……它以其主观色彩特别浓厚、重议论不重铺陈的特点，不仅将自己和其以前出现的杰作区分开来了，而且还能和它们分庭抗礼。”^①的确，与王维、韩愈、刘禹锡、刘商等人的桃花源诗相比，宋诗重议论、重思理的特色在王安石这首《桃源行》中已经体现得相当明显。

那么，此诗作于何年？蔡上翔等《王安石年谱三种》、沈钦韩《王荆公诗文沈氏注》、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等均未提及。按，宋初诗坛以桃花源为题材的诗歌仅见梅询《桃源》和张方平《桃源二客行》。这两首都以桃花源为仙境，未脱唐人窠臼。但梅尧臣写有一首《桃花源》诗，与王安石之作颇有关涉。全诗如下：

鹿为马，龙为蛇，凤皇避罗麟避罟。天下逃难不知数，入海居岩皆是家。武陵源中深隐人，共将鸡犬栽桃花。花开记春不记岁，金椎自劫博浪沙。亦殊商颜采芝草，唯与少长亲胡麻。岂意异时渔者入，各各因问人间赊。秦已非秦孰为汉，奚论魏晋如割瓜。英雄灭尽有石阙，智慧屏去无年华。俗骨思归一相送，慎勿与世言云霞。出洞沿溪梦寐觉，物景都失同回槎。心寄草树欲复往，山幽水乱寻无涯。

两诗相较，我们发现梅诗前十七句与王诗前十四句不仅诗意颇为相似，而且“鹿为马”、“商颜采芝草”、“秦已非秦孰为汉，奚论魏晋如割瓜”等语句与安石“望夷宫中鹿为马”、“避时不独商山翁”、“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等不无雷同。梅诗是仁宗嘉祐元年（1056）在汴京应张颉之请而作。而嘉祐元年至二年，王安石兄弟也在京城，和梅尧臣来往密切，多有同席赠别、同题唱和之作。如梅尧臣有《送吴辩叔知巩县》（1056）、《寄题郢州白雪楼》（1056）、《永叔白兔》（1056）、《赠梁公十二代孙国宾》（1056）、《永叔席上分韵送裴如晦》（1056）、《和吴冲卿学士石屏》（1056）、《送周仲章都官通判湖州》（1056）、《农具诗十五首》（1056）等^②，王安石也相应作有《送直讲吴殿丞宰巩县》（1056）、《寄题郢州白雪楼》（1056）、《信都公（欧阳修）家白兔》（1056）、《圣俞为狄梁公孙作诗邀予同作》（1056）、《送裴如晦宰吴江》（1056）、《和吴冲卿鸭树石屏》（1056）、《送周都官通判湖州》（1056）、《和农具诗十五首》（1057）等等同题之作。据此，这首《桃源行》应当也是王安石对梅尧臣《桃花源诗》的模仿之作，应作于嘉祐元年或二年。

①程千帆：《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1页。

②以上诗篇及系年，见《梅尧臣文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 《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一《和王乐道烘虱》

秋暑汗流如炙輶，敝衣湿蒸尘垢浼。施施众虱当此时，择肉甘于虎狼饿。咀啮侵肤未云已，爬搔次骨终无那。时时对客辄自扪，千百所除才几个。皮毛得气强复活，爪甲流丹真暂破。未能汤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炉炽炭已不暇，对灶张衣诚未过。飘零乍若蛾赴灯，惊扰端如蚁旋磨。欲殴百恶死焦灼，肯贷一凶生弃播。已观细黠无所容，未放老奸终不堕。然脐郿坞患溢世，焚宝鹿台身易货。冢中燎入化秦尸，池上煨随迁莽坐。彼皆势极就烟埃，况汝命轻侔涕唾。逃藏坏絮尚欲索，埋没死灰谁复课。熏心得祸尔莫悔，烂额收功吾可贺。犹残众虬恨未除，自计宁能久安卧。

此诗作年，《王安石年谱三种》、《王荆公诗文沈氏注》、《王安石诗文系年》等均未提及。按，此题司马光有唱和之作，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和王介甫〈烘虱〉》，前一首为《和介甫〈明妃曲〉》。因此，此诗当是王安石、司马光和王乐道在嘉祐年间同声唱和之什。王乐道，即王陶，《宋史》卷三百二十九有传，谓：“王陶，字乐道，京兆万年人。第进士，至太常丞而丁父忧……嘉祐初，为监察御史里行……陈升之为枢密副使，论其不当，升之去，陶亦知卫州，改蔡州。明年，复以右正言召。”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二、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六载：嘉祐四年（1059）秋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为监察御史里行”；嘉祐五年二月，“戊辰，太常丞、监察御史里行王陶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嘉祐五年七月，“壬子，命翰林学士吴奎、户部副使吴中复、判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马利害以闻”；嘉祐六年四月，“庚午，右正言王陶知卫州”；嘉祐七年三月，“丙辰，召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谏院供职”。据以上履历，《和王乐道烘虱》应是王安石与王陶在嘉祐五年七月后同相度牧马利害时所作，诗中所云“秋暑汗流如炙輶，敝衣湿蒸尘垢浼”的景色也与时令恰相符合。而到了嘉祐六年四月，王陶已经出知卫州。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此期间一为度支判官，一为度支员外郎，彼此之间也有唱和，故司马光亦得参与二人唱和中。

这首诗歌的特殊之处在于以“烘虱”为题材，相当别致。在北宋之前，从来没有诗人以“虱”入诗。梅尧臣敢为天下先，第一次将虱子这一日常生活中琐细丑陋的事物纳入到诗歌创作中予以艺术表现。如其《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贫衣弊易垢，易垢少虱难。群处裳带中，旅升裘领端。藏迹讵可索，食血以自安。人世犹俯仰，尔生何足观。”后来他又陆续写有《扪虱得蚤》、《秀叔头虱》两首，体现出可贵的艺术开拓精神。不过，从这三首作品来看，梅尧臣在这一题材上的尝试并不成功。它们或是平铺直叙，或是空发议论，索然无味：“兹日颇所惬，扪虱反得蚤。去恶虽未殊，快意乃为好。物败谁可必，钝老而狡夭。穴蚁不啮人，其命常自保。”与之相比，王安石《和王乐道烘虱》则在艺术表现上后来居上，远超前作。诗歌吸取了韩愈《落齿》等诗歌的精髓，利用夸张、

对比等手法,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将生活中一件琐碎无聊的细事,表现得极为幽默戏谑,情趣盎然,成功地实现了“宋调”的超越。

3.《临川先生文集》卷五《和吴御史汴渠诗》

郑国欲弊秦,渠成秦富强。本始意已陋,末流功更长。维汴亦如此,浚源在淫荒。归作万世利,谁能弛其防。夷门筑天都,横带国之阳。漕引天下半,岂云独荆扬。货入空外府,租输陈太仓。东南一百年,寡老无残粮。自宜富京师,乃亦窘盖藏。征求过夙昔,机巧到莛芒。御史闵其然,志欲穷舟航。此言信有激,此水存何伤。救世诟无术,习传自先王。念非老经纶,岂易识其方。我懒不足数,君材仍自强。他日听施設,无乃弃篇章。

《王安石诗文系年》以吴御史为吴冲卿,故不凭任何考证即附于《次韵冲卿过睢阳》诗下,系于嘉祐六年(1061)。误。按,《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吴冲传》:“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与兄育、京、方皆高第。调谷熟主簿,入为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改知太常礼院……忤执政意,出知高邮军。还为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历知陕州、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寻权盐铁副使。熙宁元年,知制诰……遂同知谏院……为安抚使……知审刑院,权三司使,为翰林学士。三年,拜枢密副使……进检校太傅枢密使。”由上可见,吴冲生平从未曾任过御史,又焉来《和吴御史汴渠》诗?

其实,此诗所和之吴御史乃吴中复,而非吴冲。《东都事略》卷七十五《吴中复传》谓:“仲复,字仲庶,兴国军人也。举进士,为招信尉、金坛令。知犍为县,通判潭州。孙抃未识中复,即举为监察御史里行……迁殿中侍御史里行,弹治宰相。梁适罢,中复亦出通判潭州,未至,知池州,复召还。宰相刘沆逐言官赵抃、范师道,中复论沆……为殿中侍御史,改右司谏。论贾昌朝不宜拜枢密使,迁同知谏院、侍御史知杂事,除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阁待制、知潭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载,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庚申,太常博士吴中复为监察御史里行,用中丞孙抃所荐也。”随后吴因弹治梁适通判潭州,后知池州。直到仁宗至和元年(1054)十月还京:“丙申,主客员外郎吴中复为殿中侍御史里行。此盖从赵抃之言。”^①

吴中复《汴渠》一诗当时唱和者颇多。除王安石外,梅尧臣也写有《吴仲庶殿院寄示与吕冲之马仲涂唱和诗六篇邀予次韵焉·汴渠》。“殿院”盖指“殿中侍御史里行”。梅诗作于至和二年,故吴中复原诗及王安石的唱和之作均作于至和二年。此时王安石在京任群牧判官,故得以与吴唱酬。

就艺术成就而言,王安石的和诗并无特别出彩之处。不过,诗中大谈水利,就汴水漕运之利弊展开讨论,从中见出王安石于兴修水利等事一直是素所留心。如云:“漕引天下半,岂云独荆扬……自宜富京城,乃亦窘盖藏。征注过夙昔,投机到莛芒。”这种认识,与他任地方官期间屡修水利,以及执政后颁行均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4378页。

输法等是前后一致的,可见其经纶天下之意。至于所谓“救世诂无术,习传自先王。念非老经纶,岂易识其方”等,则是他“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学术理念的体现。

4.《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答王景山书》

众所周知,王安石与李觏是否具有学术上的渊源关系,一直是宋代思想史研究中的焦点之一。这封书信就提供了重要线索。书谓:“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可惜《王安石年谱三种》、《王荆公诗文沈氏注》、《王安石诗文系年》等俱未考证年月。王水照、高克勤编撰的《王安石散文选集》选入此文,其“题解”将此文大致系于庆历年间。

按,王景山,即王开祖,号儒志先生,永嘉人,其《儒志编》附录《儒志学业传》谓:“少敏悟,书经目辄成诵……初习制科,以所业上,召试。皇祐五年,中第三甲进士第……景山幡然不调而归,尽焚旧作,纵观经史百家之书,考别差殊,与学者共讲之,席下常数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几而卒,年三十二……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来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王景山主要活动于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4),故王安石此信也应作于此期。

信中又提到尹洙(师鲁)。据欧阳修《居士集》卷二十八《尹师鲁墓志铭》,尹洙卒于仁宗庆历七年(1047)四月。信中谓“书称欧阳永叔、尹师鲁、蔡君谟诸君以见比。此数公,今之所谓贤者,不可以某比”,可见写此信时尹洙仍在世或去世不久。然则此信当作于庆历七年左右。又,书中有二人相约面晤之语:“闻将东游,它语须面尽之。”所谓“东游”,盖指王景山入天台县学一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十五《朝议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铭》谓:“(石牧之)增广天台县学,择乡先生居师授之任,以延俊造。县事闲,则亲为讲说。远近向慕,负笈而至者,若王景山、余京、方援、伍原辈,同时出黉下。”那么,石牧之何时增广天台县学?《闽中理学渊源记》卷十载陈襄所作《天台县孔子庙记》(原注:皇祐元年作)谓:“天台县有孔子庙不修,县令石牧之始至岁十月,相县之城南隅,大作新庙。”“十二月,庙成。明年,春秋释奠,入而行礼。”据此,石牧之于皇祐元年(1049)出任天台县令,并于本年十月增修天台县学,然后“择乡先生居师授之任,以延俊造。县事闲,则亲为讲说。”王景山应是此时听到石牧之增广县学之事,才有意“东游”。而此时王安石尚知鄞县,直至皇祐二年五月秩满离鄞。天台与鄞县相邻,故安石有“它语须面尽之”之语。如上所考,此文当作于宋仁宗皇祐二年初。

从这封书信可知,王安石与王景山在庆历、皇祐年间应当进行过学术上的交流。这为我们考察王安石早年学术思想提供了珍贵线索。在王景山《儒志编》中,许多论题与王安石彼此呼应,如其中对伯夷、叔齐之事的质疑:“或曰:‘文王为西伯,太公、伯夷,天下之元老,相率而归之,其心同。文王建一善谋,行一善制,二老相与佐之,其心亦同。思救天下之民也,不啻如出诸水火。武王伐

纣,太公为之将兵,天下已归周,北面而受封焉。伯夷独以为不义,不食周粟而死,其心若不同,何也?’”^①王安石名作《伯夷》即是对此问题的正面回应:“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呜呼,使伯夷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②尽管二人观点不同,但却是基于同一学术问题、背景而发。特别是王景山对于中唐以来甚为流行的“性善情恶”论的驳斥,以及他对士人仕隐之道的论述等,与王安石的人性思想及出处哲学尤为相近^③。这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王安石的思想与宋仁宗庆历以后学术整体趋向之间的关系。

5.《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二《繁昌县学记》

《王安石年谱三种》、《王荆公诗文沈氏注》、《王安石诗文系年》等俱未系年。按,文中谓:“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则修而作之(县学)。”夏希道于仁宗庆历七年(1047)知繁昌县,至后二十七日便营造县舍。曾巩《繁昌县兴造记》云:“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为门以通道往来,而屋以取固。即门之东北,构亭瞰江,以纳四方之宾客……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庆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④据此,则知繁昌县兴造工程于庆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完工后,夏希道分别请求曾巩和王安石为之撰记,故此文应当作于庆历七年底。

这篇文章在文体史上颇具价值。学记是随着宋代官方从上而下推行的办学运动而兴起的一种新文体。许多名家作手均曾染指于此,并且多有名篇佳什传世。评论家们认为,学记是“记”体中“最不易为”的一种,它的创作典范是由王安石和曾巩奠定的^⑤。而这篇《繁昌县学记》作于庆历七年,是王安石的第一篇学记作品。文中交代了学记的创作缘起——庆历兴学:“至今天子始诏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学,奠孔子其中,如古之为。而县之学士满二百人者,亦得为之。”表述了兴学的崇高理想:“古者自京师至于乡邑皆有学,属其民人相与学道艺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学之所自。于是乎有释菜、奠币之礼,所以著其不忘。”^⑥与王安石的另一学记名篇《虔州学记》相比,虽然略显粗糙,但艺术表现上的演变轨迹还是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①《儒志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675页。

③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④《曾巩集》卷十七,中华书局,1984年,第277-278页。

⑤刘成国:《宋代学记研究》,《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⑥王安石:《繁昌县学记》,《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二,第863页。